

N4A

新志歲月

荆州市史志办公室
荆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

二〇一二年九月

序

刘曾凡

金秋十月,丹桂飘香。在全市人民实施“壮腰”工程,加快荆州振兴,以打造湖北经济增长第四级的豪情壮志,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,由荆州市史志办公室、荆州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共同编撰的《难忘岁月》一书付梓出版,这是我市新四军老战士和史志工作者向党的十八大敬献的一份厚礼。

70多年前,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,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,在华中敌后,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铁军——新四军。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,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,活跃在大江南北,转战于江淮河汉,与凶残的日伪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。新四军指战员不怕牺牲,前仆后继,与日伪作战 24600 余次,取得了毙伤俘日伪军 47 万余人的辉煌成果,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,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绩!

荆州位于湖北省中南部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,是新四军五师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。在抗日战争时期,他们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,相继建立了鄂中、襄西、襄南及石公华等抗日民主根据地,成为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织部分。这段厚重的历史,是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光荣和骄傲。

岁月的流逝,没有抹去人们对那段难忘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。《难忘岁月》一书文章的作者,大多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老战士,他们以亲身经历,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在抗日战

争、解放战争中的一个战斗故事。语言朴实,感情真挚,读来既亲切又凝重。它宣传的是我党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,弘扬的是坚定信念、爱党爱国、为民奋斗的主旋律。书中新四军后代和史志工作者的文章,热情讴歌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。捧读书稿,深为革命先辈们的精神所感动。

当前,荆州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,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。在新的征程上,我们要大力弘扬“铁军精神”,以勇于拼搏的精神、担当责任的品质、思想解放的活力、敢为人先的胆识,同心同德,开拓进取,努力推进荆州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,为把荆州建设成为湖北长江带的“钢腰”、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市、长江沿岸明星城市而努力奋斗。

(作者系中共荆州市委常委、市委秘书长)

目 录

序	刘曾君(1)
挥戈跃马 鏖战荆襄	李人林(1)
回忆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的几次主要战斗	杨震东(13)
中原突围与重返大洪山纪事	王 力(18)
李人林率部巧计渡江	郑怀远(24)
烽火岁月中的红色电波	居锦昌(28)
这一仗打得真漂亮	吴志峰(32)
战时口岸古长堤商埠的开辟和建设	刘学发(34)
叫日寇闻风丧胆的地道战	许锡恒(38)
传奇式抗日英雄饶民太	饶大志(42)
活捉国民党少将军统特务	张泽生(53)
塔山英雄 伉俪情深	李同仁(57)
南征北战 一心向党	李继纯(64)
戎马倥偬话当年	程 虹(70)
归心似箭找部队	袁仕友(79)
英勇善战的团政委——李秉范	熊传甫(83)
红色沙岗	周光旭 龚明檀(87)
策反“郝穴”舰	何小云(92)
忆争取伪军曾尚武二三事	周方林(96)
坚持地下斗争 迎接沙市解放	傅 强(102)

有胆有识 慧眼识奸	吴志峰(107)
一场激烈的巷战	舒 雷(111)
我曾接待过周恩来	刘明凡(114)

两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

——记蹇先任与谭友英的一段往事	严纯钦(116)
“新升隆”轮遇难纪实	尹红杰(119)
简舜卿和他的自卫队	韩 涛(123)
忆接管沙市前后	张 健(125)
沙市解放前后的公安工作	张词华(129)
百废待举 接管学校	丘 克(132)
建国初期的沙市店员工作	司光绣(134)
我与建国初期的沙市	钟兆祥(138)

滔滔荆江树丰碑

——铭记李先念在荆江分洪工程中

的历史贡献	朱厚燊 肖本新(144)
爸爸教我种红薯	赖翰明(152)
父亲的档案	刘建华(154)
信念坚定 忠贞不移	朱 奎(158)
手枪队巧袭敌军官	

——父亲王力的战斗小故事

王小力(162)	
战火中的青春	曾平 曾兰(164)
父亲从军记	秦 琴(168)
平凡人生 高风亮节	焦方珍(173)
难忘的日子	马桂成(177)
父亲难忘的战斗经历	黎 明(180)

青山脚下感受历史足音	万书萍(182)
绣花门帘巧退日军	
——母亲抗日小故事	江培仁 江培红(185)
永远的怀念	钟兆祥(187)
生灵十万诉苍天	
——日军炸毁堤防溃口成灾纪实 ...	蔡养廉 夏学林(192)
日本侵略军在沙市血债累累	何小云(195)
营救美军飞行员	熊传甫(197)
日本“花冈惨案”纪实	李克金(199)
血泪控诉	
——三省桥惨案纪实	蔡养廉 夏学林(203)
古城遭浩劫 华埠变废墟	蔡养廉 夏学林(206)
同仇敌忾斗敌顽	熊传甫(212)
后 记	(218)

挥戈跃马 鏖战荆襄

李人林

编者按：1984年元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司令员李人林同志，重游故地江陵，回忆了他于1943年率部开辟襄南和1946年中原突围以后，坚持同国民党军迂回作战，牵制大量敌军的战斗经历。

开辟襄南

1943年开辟襄南，是郑位三同志来新四军五师以后，根据中央总的方针决定的。

那时襄南有国民党两支部队，一是128师王劲哉部，有一两万人。二是第六战区挺进军第二游击纵队金亦吾部，有三个支队，一个特务团。日军一扫荡，金亦吾就吓住了，全部投降了。128师也被打散了。因为散兵很多，再加上金亦吾的那些人一出来，拦路抢劫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，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江陵地下党的同志张礼成、邓佑文到襄北向地委汇报情况，要求派主力部队过来。地委把这个情况向李先念同志反映，并写了报告，他同意了地委的意见。地委书记张执一同志说：“这是个好事情。是个好机会，我们就是要干。”于是1942年底派一个县指挥长带四个连过河，因为离分区太远，又不能一下子深入到里面来，没几天，就被日军扫荡过去了，受了

些损失。第二次,又派一个县委书记率领部队过河,不到一个星期,也被日本人和伪军金亦吾的部队打过去了,敌人越搞越嚣张。张执一同志说:“不管敌人有多狠,为了拯救襄南的人民,重返洪湖,我们非过去不可。”那时,分区司令员是个民主人士,副司令员是王海山,我是参谋长。张执一同志叫我带45团的一个营和张礼成、邓佑文同志一块过去。

部队一过河,就等于进入了敌人的合围圈。因为潜江、江陵大部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,龙湾、浩子口、丫角、岑河口、普济观、新沟嘴、老新口及东荆河那一带,到处都驻有日本人。我们接受前两次过河受挫的教训,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敌人牵制在襄南地区,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,在襄南站住脚根,任务真是艰难得很。部队是晚上过的襄河,一过河就连夜拉到江陵的土地口,并马上埋伏起来。接着,我就同张礼成、邓佑文等同志一方面了解情况,布置任务,一方面给伪军做统战工作,还给土匪头子刘银国写信,叫他同我们合作抗日。

过了几天,日本人发觉了我们,几处的敌人都出来了,组织了一个大合围。我们先已作了些准备,采取“贴烧饼”的办法,一下子就把部队拉到岑河口。晚上,部队一到岑河口就封锁消息,战士穿便衣放哨,还派当地的段振经带地下武装监视敌人。同时,作好应付敌人扫荡的准备。这个地方原来是苏区,老百姓和我们的关系很不错,看我们没有船就给我们找船,还站岗放哨,传递情报,对我们支持很大。这样,日本人在那里搞了两天,到处找不着我们,就只好撤回据点去了。敌人一走,我们马上就回来了。不久,敌人又第二次扫荡,他们轻视我们,来的人不多,我们一下子就把他们打垮了。

我们反击敌人的局部扫荡,搞统一战线,做群众工作,都得到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,所以很快站稳了脚根。

统战工作一开始就收编了倪辑五,他拥有二三百人,是我

跟他谈的话。根据地委指示,委任他为江陵抗日自卫团团长兼县长。后来,杨华堂、田美艾等几股伪军主动投向我军,我们就让倪辑五统一管理。对坚持与人民为敌的伪军,我们则坚决予以打击。前面提到的刘银国,原是金亦吾的直属大队,有600人枪,驻守在张金河。我们去信叫他投降,他拒不投降,我们一家伙就把他的部队打垮了,歼灭了一部分,其余的被打散了。有了这一仗,这里的局面就打开了。

到了四月份,金亦吾的特务团长李正乾,率1500人、600多条枪毅然起义,开到洪宋场、李家场这边来投靠我军。当时,根据地的中心就是从洪宋场到土地口这一带。后来整编的时候,就把李正乾的部队和我们的45团合编成了三个团(每个团5-6个连),属襄南中心县委管。接着,我们就攻占了监利的周老嘴、分盐等地。

1943年,我才只29岁,真操心啊!局面没打开之前,心里着急,一两个月都没睡好觉。局面打开后,倪辑五过来了,李正乾也过来了,心里更着急,因为我们没有钱呀。收编那么多部队,要吃粮食,就只有找老百姓去借,而且都是我们部队去帮他们去借,一个通讯班全部为他们服务。那里的老百姓真好,都支持我们。人多了,住的地方也成问题,我看李正乾是个“光棍”,我也是个“光棍”,我们俩住在一起,就谈开了。

他说:“这下我可看到了,你们共产党非胜利不可。”

我问:“何以见得呢?”

他说:“你们的部队关心国家大事、军队的大事,生怕我那部队的人饿了,都在积极地帮助借粮。你们的这些人,上面不说,他们都动;我们的那些人,你说他也不动,这证明你们部队就是能胜利。”

我说:“因为我们有一个崇高的理想,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。”

他是个知识分子,明白了革命道理,后来就下决心干,我们就选他当了指挥长。

江南有一支“和平建国军”在我们附近活动,常跟杨震东打交道。我把他们的头头找来谈话。这个人很狡猾,又爱抽鸦片烟。我做他的工作是想争取他过来。我说:“你干脆把鸦片烟带来,我这里没有鸦片烟。”他果然带过来了,还叫我抽两口,见我表示拒绝,接着又劝:“无论如何都要抽两口,咱们交个朋友嘛,你抽了精神会好些的。”我见他这么说,就抽了两口。但是我说:“我再不能抽了,我们共产党是不能抽大烟的。”这个伪军头目还是师一级的,不过他们是编制大,人很少,后来一部分人投向我军了。

总的来说,第一步打开局面是很不容易的。

那时同志们说,建立根据地有三部曲:第一部是打开局面,第二部是建立政权,第三部是发动群众,清匪反霸,减租减息,发展生产。同时,还把东荆河的河堤修好了,在这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。

建立地方政权,首先是在江陵进行的,县长是倪辑五。乡政权是地方县委建立的。乡下面的保甲组织都是利用原来的旧保甲长,在我们根据地内部就选择好了的,接近敌人的区域就利用两面手法。他不应付敌人,自己存在不了;完全应付敌人不应付我们,也不行,只有搞两面政权,对少数特别反动的也杀掉了一些。

当时,江陵的地方游击武装——县大队和区中队是很积极的,他们打了杨华堂伪军,把那个部队改组了。田美艾开始时投向我军,后来又叛变了,是地方武装把他打垮的。刘银国等部的散兵游勇很多,成了许多小股土匪,“司令”多如牛毛,也是地方武装把他们收编了,发展了几个连。段振经带的区中队,活动在岑河口、丫角庙一带;邓杰是普济到郝穴这边的区委书记,他

带的区中队活动在这一方。区委一活动,就把日军牵制住了。

局面打开了,并且有了根据地,我们就临时组织了一个领导机构,名叫襄南指挥部,我是指挥长。这时候,分区又过来一些人,刘放同志又带了一个营过来了,他兼指挥部政委。党的机构开始成立时叫江陵县委。搞了很短一个时期,大约是年底,就改成襄南中心县委。书记是我,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是吴云鹏,副政委是徐达山,行委主任刘宝田,负责财经工作的是李健、唐适宇。这些同志都是常委。指挥长是李正乾,他除了管部队以外,还管公安工作。接着成立了六个地方县委:潜江县委,书记李旭,县大队长(常委)李光庭,宣传部长蔡元农,管政权的是魏恒若;监沔县委,书记李秉范,宣传部长夏夔,指挥长青雄虎;天潜沔县委,书记杨知时;石公华县委,书记张泽生,支队长杨振东;川汉沔县委,书记李兰田,副书记彭怀堂,支队长范敏夫。还有一个天沔县委。原来的江陵县委,书记是李秉范,委员有张礼成、邓佑文、邓杰、段振经。中心县委成立后,就把江陵县委撤销了,由中心县委直接管江陵的几个小区。

中原突围

根据中央的决策,中原部队要分别突出国民党军 30 余万人的重重包围。

1946 年 6 月下旬,我们江汉军区独立旅随同中原军区纵队向襄河以西突围,到了鄂西北的武当山地区。8 月下旬,根据中央的指示,突围到这一地区的部队,组成鄂西北军区,就地开展群众工作,建立根据地。为策应豫鄂陕的对敌斗争,我奉命率一个团(缺一个营)不足千人,回师襄东,牵制敌人,部队经过几天的东进,于 9 月 22 日黄昏在转斗湾渡过襄河,进入大洪山、桐柏山地区,即河南的桐柏县、信阳县、确山县,湖北的京山县、

洪山县、钟祥县、随县、应山等县，坚持游击战争，相继建立游击根据地。开始，我们在那边打了很多胜仗，把国民党的乡公所、保安队消灭了不少。其中包括消灭随县保安二大队大部，生俘大队长曹玉清，击退敌 72 师工兵营等。不久，敌人向我扑来，有国民党 72 师 2 个旅、66 师 4 个正规旅，再加上河南、湖北的保安团，还有伪乡公所的武装，乱七八糟的队伍都恢复起来了，加起来共有四五万人，我们才只四五百人。百倍于我的敌人为了“围剿”我们，到处都修了碉堡，保安队守碉堡，正规军就采取车轮战术、棋盘战术，轮番袭击我们这支部队，打得我们不能睡觉。我们人少，不敢跟他们拼消耗，只能搞游击战术。但是，我们行动很积极，再加上鄂西北还有一些队伍，还是拖住了敌人。那时，正是我军在华东七战七捷，华北也打得凶，山东的国民党也很需要补充队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陈诚要把 66 师调走，但是因为我们活动得积极，湖南、湖北、四川三个省的国民党政府，要求把这个师留下，怕这个师一走，共产党部队在后面搞起来对他们不利。

为了牵制敌人，我们的部队几个月没有得到休息，饭也吃不饱，相当疲劳，实在受不住了。这时我想，我们的任务反正是牵制敌人，到哪里都一样，所以决定干脆过长江，到湘鄂边继续牵制敌人，配合武当山地区的对敌斗争。部队夜间在潜江县的泗河渡过襄河，一过河就连夜走到杨马家场，并在那里宿营，休息了一天。第二天正是农历的腊月三十，从杨马家场出发一直走到靠近普济观了。我们沿堤走，看老百姓都在做年夜饭或者吃年夜饭。天上下着小雪，路很滑，可是我们还得赶路，一直走到晚上才到公议场宿营、做饭吃。第二天拂晓之前，部队走到郝穴，准备渡江。

进郝穴之前，我们计划好了：必须坚决进入郝穴，如果进不去，我们的困难就多了，襄南的敌人都围上来就更难办了。好在

正是过年，敌人麻痹得很，都忙过年去了。于是，决定化装，穿上国民党军队的衣服，冒充“国民党 66 师补充团”冲进去。我们的侦察队全部是国民党军队的服装，戴上国民党军官的大盘帽和他们的符号。郑怀远戴着营长符号，随侦察队在前面走，一到郝穴街口，只见碉堡岗楼前有两个哨兵正在打瞌睡，一上去就把两个哨兵抓住了。后来又见炮楼上驻着一个班，我们的人跑上去，一枪没放，把敌人全部俘虏了。

为了赢得时间，保证尽快渡江，我们计划是分三方面去工作，第一部分人由郑怀远负责，消灭郝穴所有的敌人，并掐断通江陵的电话线。第二部分由夏夔、肖健负责，找商会筹集物资和钱。第三部分人负责找船只准备过江，我负责统一指挥。

一进郝穴，郑怀远把那个班的武器收缴了以后，紧接着就到了警察所，门口有个卫兵。郑怀远一上去就打了那个卫兵两嘴巴。厉声说：“老子们在外面这样辛苦，忙着‘剿匪’，你们在屋里过得倒安逸！妈的，你们局长在哪里？”

“哎呀，局长在屋里。”卫兵一面赶紧回答一面带着郑怀远往屋里去。

这时还不到八点钟，敌警察局长正在刷牙漱口，郑怀远气势汹汹地一上去就打了敌警察局长一嘴巴，叫他们不要动，马上缴了他们的枪。他们保安队住在碉堡里。我们的人缴完枪，刚一出来，恰巧碰到大队副的勤务兵，他是给大队副的丈母娘提礼物拜年去的。郑怀远一把抓住了他。这家伙脾气还很大：“我是大队副的勤务兵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郑怀远说：“老子是 66 师补充团的营长，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快带我找你们的大队副去。”那个勤务兵见他很凶，只好带他到大队部去。

大队副也是刚起床漱口，郑怀远大声命令他：“你赶快给我集合队伍。老子们这样辛苦，你们还在过年、享福。快打电话叫你的部队集合。”

大队副不肯,说:“我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,不能随便调动队伍。要调,是不是请你叫上面来个公函?”

郑怀远一听,火冒三丈,抽出手枪:“什么公函不公函,老子这就是公函!”说着,把枪比着大队副的脑袋说:“你干不干?不干老子枪毙你!”

大队副的老婆吓得赶忙跑出来,一面向郑怀远求情:“营长,您别动气。”一面对大队副说:“营长叫你集合队伍就集合,还说什么呢?”

大队副只好乖乖地去打电话,通知部队集合。他的队伍集合之后,把枪架在一边。这些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,就全部成了俘虏。这样,除街北头的敌人来不及消灭外,其余均被我缴械了。短短几个小时,共俘虏国民党党部、三青团、警察局、保安队等近百人,缴获几十条枪,子弹也不少。

在智取敌人的同时,夏夔、肖健他们两人召集商会开会,做解释、动员工作,请他们借点钱,说明将来我们胜利了就还给他们。结果共借出了几千块现洋和几万法币。负责找船只的同志,在郝穴船民的支持下,很快组织了四十多只大大小小的木船。

这时,已快到中午了,我们钱也有了,枪也缴了,船也准备好了,就开始渡江。先过去的一个连,正渡江时,江中开来一艘轮船,船上的人很凶,其中有一个国民党中校带着他的太太。我们担心他们对渡江造成威胁,就上去把他们抓起来审问,那个中校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。我就问:“你们为什么这样狠呀?”他说:“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?”我说:“老子是新四军!”原来他以为我们是国民党的人。听我这么一说吓坏了,连忙说他们是复员的(显然是假话)。看看没有什么问题,弄他没有多大意思,就放了。

不多一会,又遇着敌人的小炮艇。因为是白天,我部大张旗鼓地过江,敌人也弄不清楚是哪个部队,就朝沙市开去了,但是

我不放心，怕敌人故意麻痹我们，如果等我们统统上船行至江中，半路袭击，那就要吃大亏了。所以就派了几个便衣去监视，同时叫岸上的几个连架着机关枪。敌人如果要干江中那个连，我们就可以消灭他。

到中午十二点，我们的部队就全部过江了，后来夏夔为这次奇袭郝穴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风雪过大江》，被载入了北京小学语文课本。

江那边有个国民党的乡公所。我们先过去的一个连到达后，他们就来欢迎。战士们知道他们不是好家伙，又不好缴他们的枪，只说：“等我们的团长过来以后再说吧。”弄得对方莫名其妙。等到我大队人马全部过去了，就把这个乡公所的枪全部下了。并说：“我们是新四军，你们愿意干的就跟我们走，不愿的就放你们回去。”接着，我们走到不远的一个街上又碰到了一个乡公所，也把他们的枪缴了。到了沙场，又缴了乡公所的枪。缴这三个乡公所的枪，都是用搞迷糊战的办法智取的。因为我们的队伍叫“补充团”嘛，穿国民党军装的、穿老百姓衣服的都有，搞得他们摸不着头脑，就只好乖乖地服从。

我们在沙场驻了一天，就开仓济贫，把国民党的粮食仓库打开了，搞宣传的同志就到群众中去宣传动员，号召他们到仓库去领粮。我们部队也都去领了粮食，老百姓都很高兴。

我们到松滋那边，又消灭了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。枪多了，手拿不下了，都换上了新式武器。

这时候，我们的部队扩大了，经请示中央同意，取了一个番号，叫“江南游击支队”。

1947年2月24日，张才千司令员带的千把人，在湖北的五峰红鱼坪同我们会合了。他带的这个团，有我们团的一个营。我们两支队伍将近两千人。请示中央：这个队伍叫什么名字？中央回电说：你们就叫江南游击纵队，司令员兼政委张才千，副司

令员兼副政委李人林。这个纵队下属两个支队,我带的部队叫一支队,张带的部队叫四支队。

江南游击纵队活动于湖北、湖南两省边界的五峰、鹤峰、桑植、石门等十多个县,国民党来个把团不敢动我们;来个把旅,也不敢拢来。只有同我们保持五六十里路的距离。我们休息,他们驻下来;我们走,他们也跟着走,又怕我们打他。这样搞了几个月,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北上,5月2日在枝江县的洋溪北渡长江,回到了荆门、当阳、远安、南漳一带。在南漳的偏头崖,罗厚福、胡恒山和其他同志带来一些人,共集结了800来人,编成一个支队,叫第二支队。纵队的名字改成中原游击纵队。五月下旬,我们纵队到了豫皖苏,敌人也随之压来,我们配合豫皖苏军区的部队打了不少胜仗,攻克了好几座县城,这时,我们的部队已改编为中原独立旅。

重返襄南

1947年8月份,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,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,即到蒋管区作战。我们的部队随刘邓大军南下在右翼行动。10月中旬,先后攻克了河南的新县、湖北的黄安(今红安)。在蕲春县的竹瓦店一战,歼敌青年军203师两个营,尔后配合刘邓大军进行了高山铺(又叫清水河)战役,歼敌48师及82旅。是年12月,新组成的江汉军区,在礼山县的陈湾召开会议,确定我率领中原独立旅旅部及第一团,和南下干部大队共1400余人挺进襄南,就是北起襄河,南迄长江,西起江荆,东至武汉外围的广大地区,开展对敌斗争,建立根据地。12月12日出发,13日由花园、广水间越过京汉铁路,连续行进,直逼天门皂市。皂市有部分土顽驻守,我们决心消灭这股敌人。20日发起进攻,敌人误认为我大部队抵达,不敢抵抗,弃阵而逃,

只歼灭了一个中队。打开皂市后,缴获的弹药很多,不能带走的就地予以销毁,爆炸声震天动地,持续了一夜,使敌人处于惊恐之中。我军乘机连克天门县城和岳口镇。22日渡过襄河,一举攻克了潜江县城。从此,我们的部队又回到襄南,同襄南人民又生活、战斗在一起了。

我们在前进,但是后面跟的是国民党整师整师的部队。

12月25日,襄南地委在潜江开地委扩大会议,讨论中原军区首长赋予我部的战斗任务:想方设法把敌人拖在长江沿岸和襄南地区,争取时间,掩护军区展开全面战略,并确定在襄南的斗争方针。那时,襄南地委书记是杨殿奎,我是司令员,专员是张旺午,副司令员有钟春霖、张水泉,政委是杨殿奎(兼)。副政委是罗通,政治部主任室是张难。地委扩大会上,根据当时的情况,组成了四个县的民主政府,方晶明任天潜沔县长兼指挥长,分区政治部主任张难兼县委书记和政委;熊光武同志任江监石县长兼指挥长,赵勃同志任县委书记兼政委;赖玉坤同志任监沔县长兼指挥长,薛坦同志任县委书记兼政委;郑怀远同志任江荆潜县长兼指挥长,刘真同志任县委书记兼政委。1948年2月上旬,又成立了川(汉川)汉(阳)沔(阳)民主政府及指挥部,彭继文同志任县长兼指挥长,李兰田同志任县委书记兼政委。后来,又成立了荆南县民主政府。每个县都给了武器,有的是一个中队,有的是一个排。要求各县在敌人追来之前把工作展开。我们直属机关只留两个营,其余的都分散了。展开以后,部队行动很快,敌人闻风而逃。一下子把土顽(保安队、乡武装)基本都瓦解了。除了监利以外,其他县如天门、潜江、沔阳等县,都被我们占领了。这样,到处都在叫,“新四军来了!”国民党85师从大别山调来,紧紧尾随我们进入襄南,52师也从武汉朝我们这里开来。因为我们的任务,一方面是开辟游击根据地,发展襄南;另一方面是牵制敌人,减轻对江汉军区的压力。所以敌人来了,